

中国社会科学院
基础研究课题

少数民族人口流迁 与城市民族关系研究

主持人：郑信哲
成 员：周竟红
张继焦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2000年11月·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
基础研究课题

少数民族人口流迁 与城市民族关系研究

主持人：郑信哲
成 员：周竟红
张继焦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2000年11月·北京

前 言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9% 左右。我国少数民族除有各自大小不同的聚居区域以外，还有一部分杂散居于汉族及其他民族之间，这种情况在城市尤为明显。城市少数民族人口占其本民族和所居城市人口中的比重虽然很小，但是居住于城市的少数民族具有民族成分多、人员素质高、分布领域广、影响力大、与本民族地区有密切联系等特点。另一方面，城市作为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中心，是民族间交往联系最为频繁的地区，加上城市具有传播媒介发达，扩散力强等功能，城市民族关系所反映的不仅仅限于当地民族之间，它所涉及的是整个所属民族间的关系问题。城市民族关系更具有波及性和敏感性，这决定了城市民族关系的重要性和研究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少数民族成员与本民族地区的联系愈益加强，城市少数民族成员的作用和影响也随之扩大。特别是，随着城市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日益增多，一些过去未曾出现的民族摩擦、纠纷事件时有发生，城市民族关系变得愈益复杂和敏感。

我国的改革开放为少数民族摆脱封闭和贫困，走向开放和发展创造了良好机遇。长期生活于偏僻边疆乡村的少数民族人口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他们从封闭的村寨走出来，以经商务工等形式纷纷涌入市场经济活跃、就业机会更多的大中城市，形成一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军。城市中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一方面保持浓厚的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又最直接、最频繁地与当地文化接触碰撞；另一方面，他们不仅与所居城市的同一民族成员和本民族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与其他城市的本民族成员也有广泛的联系，他们之间互相传递的不仅仅限于经济信息，还互相传递包括民族关系信息在内的各种信息。可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处于城市民族关系问题的最活跃、最敏感的位置上，对此我们不能忽视。

如今，我国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将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城市化过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更加频繁，城市居民的多民族化现象日趋明显，而城市作为不同民族和各种文化的主要交汇点，是民族关系问题的主要引发区。我们认真研究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现状与趋势，把握城市民族关系发展中的新问题、新情况，协调城市民族关系，对于正确解决城市民族问题，指导各民族适应多元文化，加强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友好相处，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与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及城市民族关系问题的影响及其重要性相比，我们对这类问题的研究还很薄弱。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开始涉足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城市民族关系问题研究，并得到院科研局的资助。本课题研究分为七个方面，即城市化进程与人口流迁、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现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

经济交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生活方式的适应、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多种影响、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城市民族关系、少数民族人口流迁与城市民族工作等角度，来分析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背景、现状及其趋势，阐述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城市民族关系问题的关联性，强调城市民族关系问题的重要性，指出了建立协调城市民族关系、做好城市民族工作的新机制的迫切性。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研究中除了“流动”一词外，还时常出现“迁移”、“流迁”等术语，然而我们并没有混淆用之。我们认为，“流动”是指人们把户籍留在原居住地而移动至另一地方的情况；“迁移”是改变常住户口，移动时把户籍都带走的情况；“流迁”则是流动与迁移的统称。本课题研究重点是人口流动问题，但也涉及迁移，因而时有使用“流迁”一词。

本课题通过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城市民族关系的研究，力图把握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和城市民族关系的现状及问题，探讨有益的对策，为党和国家解决新时期城市民族问题提供参考依据。然而，由于受水平所限，加之资料缺乏，难免有不妥之处，还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本课题研究，得到了院、所有关部门的具体指导和大力支持，也曾得到调查地有关部门人士的热情帮助，借此深表谢意。

目 录

前言	(1)
上篇 综合研究	
第一章 城市化进程与人口流迁	(1)
一、城市化发展对人口流迁的影响	(1)
二、当代中国人口流迁的特点与趋势	(4)
第二章 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现状	(14)
一、我国少数民族基本概况	(14)
二、少数民族人口流动背景	(15)
三、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状况	(17)
四、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特点	(19)
第三章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交往	(22)
一、城市中民族之间的交往	(22)
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的贡献	(24)
三、城市居民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态度	(25)
四、民族交往的优势—劣势分析模型	(26)
五、我国城市民族社会经济交往的特点	(28)
第四章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生活方式的适应	(30)
一、涵化理论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适应问题	(30)
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的差异	(30)
三、政府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适应中的作用	(33)
四、文化适应与冲突问题	(34)
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涵化问题	(36)
第五章 少数民族人口流迁的多种影响	(40)
一、城市居民多民族化趋势加强	(40)
二、人口流动给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影响	(42)
第六章 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城市民族关系	(44)
一、城市——民族关系问题的主要引发区	(44)
二、城市民族关系现状	(45)
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与城市民族关系	(48)
四、城市民族关系发展趋势	(50)
第七章 少数民族人口流迁与城市民族工作	(52)
一、当前城市流迁人口管理特点	(52)
二、城市民族工作面临的新课题	(56)
三、建立协调健全城市民族关系的新机制	(58)

下篇 调查研究报告

一、朝鲜族人口流动及其特点.....	(65)
二、成都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状况及其主要问题	(72)
三、关于乌鲁木齐市的流动人口与民族关系问题的调查	(83)
四、关于城市暂住和流动少数民族的管理问题之初探	(94)
五、城市民族团结的一个基层典型 —— 成都市武侯区民族工作纪实	(100)
后记	(103)

第一章 城市化进程与人口流迁

一、城市化发展对人口流迁的影响

1、城市化——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里程

城市是人类经济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而城市化则是人类社会生产向工业化、社会化、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过程。

原始社会的集市是城市的雏型，是人类社会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成果；村镇则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第二、三次社会大分工而出现的，此即城市的萌芽。随后，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期间，城市逐步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取得中心地位。一般意义上说，自从城市出现后，无论古今中外，城市往往是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中心，对社会政治运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比如，中世纪欧洲的市镇是现代当权的资产阶级产生的摇篮，而中国古代的城市无论是各朝代的都城还是地区性的城市，要么是中央政权所在地，要么就是地方政权中心。城市还是一个社会经济力量总汇之地，古代的城市在手工业、商业、交通等方面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着很强的影响力。城市也是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中心，由于城市人口集中，在政治、经济方面代表着当时社会的主流，与此相适应，文化发展速度也比较快，在文化的传播、交流、成长方面，农村是无法比拟的。然而，城市与城市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市化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城市化过程也是城市现代化的过程，是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向现代化城市社会转化的过程。

城市出现以前，人类社会生产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单一的农业经济为主体，生产力水平仍然处在以人力畜力为动力，以手工农具耕作的状况。随着城市出现及其发展，商品生产代替了自然经济，工业代替了单一的农业，动力机械代替了原始手工工具。而城市化发展，强化了城市在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地位，突出了城市在国家或地区经济、文化中的辐射、带动作用。这些作用不仅表现于有关生产、资本、劳动力等方面不断增长强势地位，还在于其在技术上的不断发展，从而成为生产、资本、工业、商业、科学技术等的集中。随着信息和服务业的发展，城市又成为信息业和服务业的中心。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城市生活与先进的技术发展密切相关，决定了城市生活的居民要有更高的知识背景和较高的文化素质。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人们的活动趋向于专业化，居民总体的知识水平和技术水平得到提高。由于城市生活所具有的开放性，使得居民的思想观念也更为开放。经济发展和需求的发展促使教育的发展质量更高，速度更快，从而使经济、技术与教育在相互需求和促动中推动着城市文化的发展。所以，城市有着凝聚、贮存、传递和进一步发展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功能。总之，城市化的发展使得城市成为一个多功能、综合性的有机体，其不仅仅属于政治

中心，更主要的则属于经济、科学、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其地位更为重要，功能和作用更为复杂。

城市化是城市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在发达国家则与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直接相关。没有工业化，城市化的出现将缺少必要条件，没有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也难以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互为因果条件。在城市化过程中，全社会的交通日益发达，城市生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不断地生成、发展并扩张。这种城市生活方式的不断扩张就是城市生活方式从城市向城市以外地区发展的过程，生活方式趋于同一化。在这一过程中，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人口在数量上大为增加，人口的观点、文化素质也有了极大的提高。

从人口变动角度来说，城市化过程主要是以农村人口为主的传统型人口地区结构被以城市人口为主的现代型人口地区结构所取代，人口的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也由传统向现代化转换。城市化就是一个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向现代化城市社会的发展过程，其本质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从农村生活向城市生活的升级转化过程。

城市化从城市本身的变化来说，是传统城市被现代城市取代的过程，每一个现代城市都发展为影响周围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心，而且各种规模的城市彼此密切联系，共同组成影响全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城市体系。当然，城市化进程的不同和各国历史发展状况的不同，使得各个不同的国家人口城市化水平不同。

依据当代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城市化专家将走向人口城市化和已经实现人口城市化的国家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高度城市化的国家，此类国家城市人口已占总人口的 70% 以上，主要集中在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等发达地区；第二，人口城市化刚刚实现的国家，城市化水平居中，发展尚不充分，其城市人口比例居于 50% 至 70% 之间，这些国家主要集中在拉美、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第三，人口正在走向城市化的国家，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第四，人口城市化刚刚起步的国家，全部为发展中国家。^① 可见，发达国家均为城市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大多数国家已经完成了城市化进程，而中等发达国家和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风头正劲，处在城市化的进程中。

城市化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每个地区城市化的发展过程都具有阶段性。城市化专家认为，其过程大约经过三个历史阶段：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 20% 以内，城市化进展较为缓慢；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 20—70%，城市化发展处于加速阶段；城市人口占总人口 70% 以上，城市化进展较为平稳。在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由于大城市具有重大技术经济优势，在资金、人才、信息、交通、市场、管理、效率等方面比中小城市都更有优势，因而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大城市超先增长，是世界城市化运动的整体趋势，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同时，城市化的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城市化水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社会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

^① 候文若：《全球人口趋势》，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 年，第 250-251 页。

2、城市化加速了人口流迁过程

当代世界被称为人类走向城市文明的时代。城市化的发展大大改变了人口的地理分布,促进了人口的急速流迁。这种促动力不仅表现于其对人口流迁量方面的影响,而且还表现于其对人口流迁的频度、幅度、流向的影响。

城市化发展对人口流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社会化大生产为人口流迁提供了基本前提。社会化大生产促进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促使大量的农业人口向非农转变,引起人口流迁。同时,社会化大生产要求按比例地分配社会总劳动量,这一分配要不断地满足人们需要的变化,从而使得社会劳动量的比例平衡不断被打破,引起人口的流迁。第二,工业化的发展为人口流迁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工业化生产具有集中性和规模性,随着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决定了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其中资本的集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资本的集中必然引起劳动力的集中。劳动力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也就是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迁的过程。工业化的发展还带动了相关产业劳动力需求量的增加,使得城市化发展对劳动人口的需求不仅限于第一产业的劳动力,还有与此相关的各个行业,大大拓展了人口流迁的行业领域和地域空间。同时,工业化的发展,不仅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水平,而且使交通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极大地方便了人口的流迁,成为推动人口流迁的重要条件。第三,城市化的发展,对农业技术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促成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农村劳动力日益过剩,为人口的流迁提供了可能,而城市本身存在的生活水平较高的特点则形成了吸引力。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加之人们趋利性的选择,最终促成人口的流迁。^①

单从人口迁移方向来考察,城市化的发展与两种人口迁移形式(或人口流动)存在密切的关系,即人口从城市向城市的迁移和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人口从城市到城市的迁移首先出现于发达国家,是人口迁移的一般性趋势,人口迁移和流动的方向往往是从小城镇→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城市规模的不同可以提供完全不同的生活条件、劳动服务条件、工作岗位、职业选择、收入来源等,大城市有着更为广阔的空间和优越地位,因而也最吸引劳动力的流迁。当然,那些具有生产和管理经验、有较高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的人口在这一流迁中占据优势。

另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多,城市生存环境日益恶劣,以及信息、交通的发达,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差距逐渐缩小,到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人口反向流迁的趋势,即出现了从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镇的新的人口流迁趋势。美国70年代以来,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绝大多数都出现了人口净迁出现象,而英国的伦敦、利物浦、曼彻斯特、巴黎等世界著名的城市人口也均处在减少的趋势。^②当然,这一流迁方向的影响力还相当弱。

^① 参见辜胜阻、简新华主编:《当代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7页。

^② 候文若:《全球人口趋势》,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244—245页。

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迁，一方面源于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和城市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另一个重要方面则源于其产业化发展对于人口的需求。如，装备工业的大规模发展，加速了农业机械化的进程，使农村劳动力得以从土地的劳作中进一步解放出来，为城市化提供人口前提。据估计，中国今后 20 年至少有 3 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城市化必然伴随着大量的城市建设，这些建设仅靠城市人口难以完成，它将需求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来充实城市中短缺的劳动力空间。

同时，由于工业的发展或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农村土地的缺乏，使得农村难以自我吸纳大量的多余劳动力，城市化的发展正好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了条件，从而能够极大地缓解农村的就业压力。城市化的发展使得工业化步伐大大加快，而现代城市生活也对服务业提出了要求，于是满足人们城市生活需求的第三产业应运而生并得到发展。第三产业快速发展需要一定的人口规模条件，即所谓第三产业服务的“门槛”人口。

从流迁人口的动机来考察，经济型流迁人口占主导地位，流迁人口通过参与城市经济活动，改善自身的经济和生活状态，这也符合人口流迁的一般规律。此外，随着城市对社会经济生活功能的加强，城市在购物、娱乐、旅游方面对流迁人口的吸引也越来越明显，并成为城市第三产业活跃的基础。

城市化与人口迁移、人口流动关系是一种内在的互动关系。城市化为人口的大量流迁创造的条件，同时人口的大量流迁满足了城市化对人口集中的要求。

二、当代中国城市化与人口流迁特点与趋势

1、新中国城市的发展及城市化趋势^①

建国初期，我国城市发展基础十分薄弱，其发展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的过程。据统计，1949 年我国的大、中、小城市共有 116 个，其中 100 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为 6 个，50—100 万人口的大城市为 8 个，20—50 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为 17 个，20 万以下人口的小城市为 85 个。城市的发展与当时的生产力结构和水平相适应，发展水平很低。这些城市中真正具有现代管理、现代经济功能的几乎没有。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城市发展取得了一些成就。当时由于受国际环境的深刻影响，中国工业化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道路，使得大城市的人口比例一直比较高，至 1957 年达 60.2%，远远超过国民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据统计，到 1961 年全国城市已发展到 208 个，城市人口达 8,299 万。此后直至 70 年代，出于对国防安全的考虑，选择了工业生产布局重内地、轻沿海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国家长期把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的重点放在中西部落后地区。虽然中西部有一批城市成长起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内地经济的发展，但是整体经济效率很低，制约了综合国力的提高。这一时期，城市发展

^① file:///d:/城市流动人口/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与回顾 .htm 刘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文。

基本处在停滞状态，特别是由于片面强调消灭城乡差别，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城乡二元分割得到强化，城市发展受到过度控制，城市人口大幅度减少，甚至造成了城市乡村化和已有城市发展畸型化的结果。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中国城市无论从人口规模，还是从相应的基础建设等方面来说都没有得到较好的发展，长期被处于低度城市化。这一状况直到1978年以后才逐步缓解，由此中国真正地开始了城市化的过程。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直接动力源于逐步深化的经济改革。首先，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农村体制改革成为推动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农村经济生活的活跃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增强了国民经济整体活力。而随着城市体制改革，特别是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的松动，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成为可能。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化的显著特点为原有城市的吸纳速度较高，同时新建城市的转化速度也较高，存在相当多的恢复性先集中、后城建的现象。第二，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由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的动力主要来自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及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呈现出新城市占主导地位的特点。第三，90年代以后，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确立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一系列开发区建设、建设国际化大都市要求的提出，使中国城市化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城市化呈现出原有城市吸纳为主的特征，而城市数目呈大幅度起伏增长的趋势。据统计，1978—1997年，中国城市化率由17.92%上升到30%，年均城市化提高达0.63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前的1.5倍；设市城市由193个增至668个；建制镇由2173个增加至18000个。

^①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城市化尚处于初级阶段，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从目前看，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主要存在着如下问题：由于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城市的分布也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性。据统计，我国东部地区面积仅为全国国土面积的14.2%，却集中了全国城镇人口及城市数目的近一半；中部地区国土面积占全国的29.2%，城镇人口及城市数目均占全国的1/3；西部地区国土面积占全国的56.5%，城镇人口及城市数目都只占全国的1/6左右。我国东西部在城市化水平上也存在一定的差距，1996年东西部城市化水平大约相差8个百分点。^②

从城市化发展的趋势看：明显存在着东部快于西部，南方快于北方的局面；随着小城镇开发建设的发展，中小城市在城市体系中的地位日益提高，一系列制度性改革也有利于中小城市的发展；一些特大城市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青岛、大连、南京等；随着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建立，一些大城市开始了郊区化的过程。^③有研究表明，从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来看，我国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未偏离所谓“世界平均水平”。

^① file:///d:/城市流动人口/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与回顾.htm 刘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文。

^② 周一星、曹广忠：《二十年来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国都市人类学通讯》，2000年第4期。

^③ 周一星、曹广忠：《二十年来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国都市人类学通讯》，2000年第4期。

《1994 年世展发展报告》计算的结果表明, 1992 年人均 310—470 美元的国家, 城市化水平在 25—29% 之间, 中国的情况处于此范围之内低线附近。世界银行《1998 年世界发展指数》提供了目前由美元价格 (1996 年) 计算的结果, 即人均 1000—1500 美元时, 城市化率在 30—40% 之间。1997 年我国人均 GDP 大约为 740 美元左右, 城市化在 30% 以下基本符合上述判断。未来的中国也将进入一个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时期, 综合考虑经济效益与资源和环境等条件, 使大、中、小规模城市的合理协调发展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未来的发展中, 城市群或城市带在城市化进程中将起到重要作用。^① 同时, 城市在产业布局、区位布局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会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 并得到合理的发展, 从而加速中国城市化进程。

2、当代中国流迁人口的特点

无论与发达国家比较, 还是与发展中国家比较,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都有其自身特点。就流迁人口与城市化的过程而言, 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长期发展, 以及改革开放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选择, 使得其人口流迁除具有一般性人口流迁的特点外, 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50 年来, 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即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 此前可称为人口计划性迁移为主的阶段和以后逐步过渡到以经济型流动为主的阶段。

在人口流迁的第一个历史阶段, 人口的流迁特点主要以非自愿迁移为主, 迁移方向、数量主要受一系列计划体制的控制, 主要有: 第一, 人口流迁受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制约, 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对整个社会的财力、物力、人力进行有计划的安排和分配, 因此, 对人口流迁中最活跃的因素——劳动力使用、分配也受国家计划控制, 国家控制了人口流迁的量和方向; 第二, 城市发展的总政策制约着人口的流迁。改革开放前, 国家控制城市的发展, 因此, 除了国家计划调动和户口管理条例允许的人口迁移外, 农村人口未经许可不能迁入城镇, 而城镇人口未经允许也不能自由迁入其他城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有相关的严格制度, 如, 严格的户口管理、严格的审批手续、介绍信、以及与计划体制相配套的相关供应制度等, 大大制约了人口的流迁; 第三, 政治运动和有关的边疆政策曾深深地影响了人口的流迁。如, 从“大跃进”到人民公社期间, 约有 1000 多万城市青少年通过上山下乡运动来到边远地区或农村。同时, 出于边防的需要, 在边疆地区设立了各类农场、牧场等, 大大改变了一些地区的人口结构。除此而外, 不同程度的民间性人口流迁依然存在, 主要是人口较多、土地较少的内地农民向边疆地区的流迁, 这一部分流迁人口大多是自愿性的流迁, 而且以经济人口流迁为特点, 但是这类流迁不占当时流迁人口的主流, 其身份也未曾得到承认。

总体上说, 这个阶段的人口流迁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流迁, 也不完全是经济型的人口流迁, 只是一种计划性、非自愿、受到社会政治和政府政策极大

^① 刘勇:《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与回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影响的非经济型人口流迁，也是一种非常态的流迁，城乡间的人口流迁关系也处在非常态状况之下。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经济结构的变化，促成了新形态的全国性人口流迁。这一时期的人口流迁以人口流动为主，不仅在地域变化方面，而且在社会地位、社会控制、有关的权利保障和生存等方面都与前一阶段大为不同。这一阶段人口流迁有如下主要特点：

(1) 流迁人口规模增大。自 1984 年 10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和 80 年代中期实施发展小城镇战略后，中国的流迁人口进入一个规模扩大化的时期。据估计，进入 90 年代年流迁人口在 5000 多万至 1 亿之间。1995 年 10 月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常驻本乡、镇、街道半年以上户口在外乡、镇、街道和在本乡、镇、街道居住不满半年、离开常驻户口所在地半年以上”的人口达 7073 万人。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大城市、特区成为人口流迁的“大户”。例如：深圳，外来暂住人口 366 万人，其中特区内 163 万人，特区外 203 万人，外来暂住人口是常住人口（1997 年底全市常住人口 109 万人）的 3.4 倍；1979 年，广东流迁人员不足 50 万人，1988 年增至 500 万，1992 年以来，每年都超过 1000 万，据 1998 年统计，广东有流迁人口 1153 万，占全省常住人口的 1/7，约占全国流迁人员总数的 1/4，是全国流迁人员最多的省份；上海，仅浦东新区 1999 年就达 37 万多人，而北京作为首都城市，流迁人口规模之大自不必多言。

大规模的人口流迁不仅存在于工商业发达的大城市，在一些边疆地区也大规模地发生着。据统计，1996 年新疆流迁人口规模达到 135.8 万人；同年，青海新兴的城市格尔木流迁人口者达 11 万余人，流迁人口比例高达 62.5%。

(2) 流迁人口分布地域广泛，跨省区流迁有增强趋势。由于经济生活的活跃，以及交通运输的相对方便，人口近距离流迁量和幅度大大增加。据统计，从 1992 到 1996 年，全国省际迁移在总永久迁移人口中所占比例在 12.65% 到 14.83% 之间变动，85% 以上的永久性人口迁移发生在省内，迁移距离较短。^① 向商业和工业中心地区的远距离流迁也同时存在，但是总体而言比在省内的迁移量小。统计表明，在沿海工商业发达地区，近年来流迁人口增幅很大，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为例，流迁人口来自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占流迁人口总数 1% 以上的省市有 11 个，第一位为安徽省 116821 人，占 30.81%，以下依次为江苏 92087 人占 24.28%，浙江 44576 人占 11.76%，四川 37959 人占 10.01%，江西 21039 人占 5.55%，河南 14013 人占 3.70%，湖北 11399 人占 3.01%，福建 8529 人占 2.25%，山东 7650 人占 2.02%，贵州 4811 人占 1.27%，湖南 4213 人占 1.11%。以上 11 个省市在浦东新区人口数共有 363097 人，占流迁人口总数 95.75%。11 个省市流迁人口在浦东新区务工比例较高的有：四川占其总数的 80.56%，湖北占其总数的 69.79%，贵州占其总数的 69.75%。经商以福建比例为大，占其总

^① 杨红：《改革以来中国永久性迁移人口和流动性迁移人口的比较研究》，《西北人口》，1999 年，第一期。

数的 38.00%，其次为浙江占其总数的 24.57%，江西占其总数的 21.79%。^① 在新疆省际流迁人口占全疆流迁人口的 58.83%，而流入拉萨市的人口源于全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

(3) 流迁人口类型多元化，经济型流迁人口占据流迁人口主流的趋势。人口流迁的动因有很多，可分为经济型、社会型、文化型等，经济型主要是以务工、经商等方式获得经济收入的流迁人口，城市流迁人口中这类人口占有绝对多数，深圳经济型流迁人口占总量的 90.2%，1996 年以务工经商为目的流入新疆的人口占流入新疆总人口的 79.08%，1997 年上海市流入人口中因务工、务农、经商等为目的的经济型流迁人口约占流迁人口总数的 74.5%。除了经济型流迁人口，还有社会型流迁和难确定型流迁等，但对流出地和流入地影响较大的仍然是经济型流迁人口。

(4) 性别比差距大，男性占绝对优势。流动人口中男性比一直高居榜首，占绝对优势，如上海市的浦东，近两年的户口登记表明，男性占 62.18%，女性占 37.82%，在拉萨市进行的人口流迁调查也显示，流入拉萨市的人口男性占 62.5%，女性占 37.5%。

(5) 流迁时间有长有短。一些城市近年来永久迁移人口虽然增加不多，但是通过工作调动、毕业生分配等渠道仍有一部人口迁入城市，成为城市永久性迁移人口。与此同时，流动人口却大量增加，而且时间的长短呈多元化。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为例，滞留浦东新区的流迁人口的时间：不足 6 个月者占 47.71%；6 个月至 1 年者占 10.38%；1 至 2 年者占 15.97%；2 至 5 年者占 16.32%；5 年以上者占 9.62%。^② 据 1996 年新疆公安厅人口年报资料显示，新疆流动人口居住一个月以下者占 34.94%，一个月至一年者占 30.59%，一年以上者占 34.48%。^③

(6) 流动人口的年龄构成中青壮年比例高。青壮年是社会劳动力队伍的中坚，也是人口流动中的活跃分子。他们除了其自身所特有的生物意义上的活力外，主要还由于他们还是一个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他们劳动所得的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家庭的生存状况和条件。同时，基于其特有的年龄条件，其在接受新鲜事物方面有着优势，宜于适应新生活，因而为其流动创造了基本条件。此外，从某种程度上说，青壮年属于非技术型流动人口的主要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在当前的流动人口构成中，来自于农村的非技术型劳动力人口占绝大多数，如北京流动人口约 300 百万，其中建筑工地就有 60 多万人，占总流动人口人口的 20%。

(7) 流迁人口文化程度构成多元化。改革开放后，流迁人口大量增加，但流迁人口的文化程度构成呈多元化，或者说不同类型的流迁人口文化水平不同，但总体文化水平低。由于发达地区对人才的吸引政策、经济态势及面临机遇多等的影响，流迁人口中不仅有大量的农民工，也有相当数量的专业技术人才。

^① <file:///d:/城市流动人口/浦东新区外来流动人口概况.htm>。

^② 同上。

^③ 任强、原新、马红梅：《新疆流动人口分析》，《人口研究》1998 年第 6 期。

在上海浦东新区的流迁人口中,受教育程度在大专及大专以占总数 1.81%,中专及高中占 8.30%,初中占 56.81%,小学占 26.91%,还有一部分文盲半文盲,初中以下受教育程度占总人数 89.90%,^①可见流迁人口文化素质总体水平较低。另有资料表明,流迁西部城市的人口文化水平总体高于当地人口的水平。如,流入新疆人口的平均文化水平高于本地人口,特别是小学和文盲半文盲平均低于新疆本地人口,当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除了要考虑流入人口多源自于经济、教育较发达地区这一基本因素外,还要充分考虑民族文化差异的影响。总体上说,流迁人口的文化构成在不同的地区呈现不同的状况。

(8) 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城乡间族际人口流迁。随着人口流迁规模和地域的扩大,人口族际间的流迁得到加强。一方面是大量的少数民族人口向以汉族为主体的城市流迁,另一方面则是更多的汉族向少数民族地区的城市、乡村的流迁。全国 600 多个城市中,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少数民族人口居住和流迁。如,到 1990 年甘肃省临夏州通过劳务输出等方式转移劳动力超过 20 万人,^②90 年代后期东北朝鲜族已有 20 余万人流入山海关以南地区进行经济经营活动。1995 年深圳进行的百分之一人口调查显示,全市少数民族人口为 3.1 万人,比 1990 年增长了 8 倍,到 1998 年则达到了 4 万余人。与此同时,青海、新疆、内蒙、云南、西藏等民族地区城市或乡村中,有大量的汉族人口流入,据 1983 年统计,进新疆的流动人口为 18 万余人,其中汉族占 67.12%,1996 年流入新疆的人口增长到 135.8 万,约占整个新疆总人口的 8%。^③

(9) 流迁人口对中国城市化发展形成民间推动力。在 80 年代中期,人口的流迁促进了小城镇的迅速发展。据统计,1982 年—1987 年,有 18% 的迁出人口来自城市,而有 36.6% 的迁入人口进入城市。同一时期,迁出镇的人口占总迁出的 14.1%,而迁入镇的占 39.8%,迁出县的人口占总迁出人口的 68%,迁入县的人口占总迁入人口的 23.6%,农村有大量的净迁出人口。进入 90 年代中期,城市流动人口在总流迁人口中比例明显增加。随着经济和社会和发展,90 年代后,束缚流迁人口的一系列政策有所放松,于是形成了使世人注目的各种人口流迁的“潮”,无论是孔雀东南飞,或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开原居地向经济发达、就业机会多的沿海地区转移,还是经济发达地区乡镇企业对各类劳动力的容纳,都成为来自于社会的推动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力量。

(10) 不同户口性质的人口流迁和流迁的部门选择不同。由于中国仍然存在着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差别,从而使得不同的流迁人口可选择部门不同。非农业人口迁移主要流向正式部门或相对要求有较高技术文化水平的部门,他们迁移的途径大多通过学习培训、工作调动、分配录用等。农业户口人口则主要流向非正式部门,务工经商是其主要流迁类型。因此,与工商业相关的各个非正式部门是其必然的选择。

^① <file:///d:/城市流动人口/浦东新区外来流动人口概况.htm>。

^② 梁正君:《我国族际人口流迁现状及期成因》,《民族论坛》1999 年,第 3 期。

^③ 任强、原新、马红梅:《新疆流迁人口分析》,《人口研究》1998 年,第 6 期。

3、人口流迁的趋势

人口流迁是一个涉及面十分广泛的问题，其不仅影响到流迁者本身，还将影响其流出地、流入地，并深刻地影响着整个社会。人口流迁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总是利弊互现，需要积极的引导使之更加合理化，使之向更有利于社会进步方向发展。人口流迁如何向有利于全国经济和社会稳定方面发展，主要依赖于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法规和措施来规范人口流迁，使之有序、合理健康地发展。

从人口流迁趋势来说，随着各地经济的发展和全国工业化、城市化步伐的加快，流迁人口仍将保持强劲的势头。无论是从流迁时间、地域，还是从类型、民族等来观察，人口流迁仍将呈现多元化趋势，但是人口向城市的流迁则构成流迁人口的主流。人口流迁这一趋势的存在和发展是一个社会在其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所不可缺少的过程，这既是人口流迁的过程，也是劳动力再分布和生产再布局的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现象。

目前，中国已经具备了人口继续流迁的一些重要条件。首先，户口管制的某种程度的放松和粮食副食品、住房等重要的生活必需品供应体制的变革，为人口自愿流迁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条件。改革开放以前，严格的户口管理体制和与之配套的基本生活用品的供应体制，使得流动人口几乎无法在没有正式户口条件下在城市生存，从而在根本上限制了人口的流动。改革开放后，经济生活日益活跃，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物流也带动了人流的扩张，人流的扩张也促成了商品经济的发达，从而在经济基础和人流大增这两个方面，促成了户口管制的逐步松动。特别是原有的日常生活必需品供应体制的打破，大大降低了户口与个人生活的关联度。由此，人们出于寻找个人的发展空间、获取更多经济收入等目的，做出流迁选择成为可能。

第二，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存在、城乡差别的存在、以及不同地区发展机会差别的存在促使具备相应条件的人们继续选择向商业和工业中心地区——城市和经济发达或重点经济发展区域流迁。因为，商业和工业中心的经济的发展速度快，有着大量的经济信息，也比经济发展相对迟缓的地区有着更多的机会，现实的收益、良好的收入预期都成为人口流迁的重要动因。重点经济发展区域现实收益可能并不十分好，但是其未来的收入看好，政策条件宽松，同样十分吸引人。此外，一些较发达地区的无地农民，为了获得较好的收入，也在向有开发前景的边疆地区流迁，如，新疆在南疆建设棉花基地就吸引了大量的外地农民进入这一地区，成为棉花大户。

第三，便利的交通运输，大大方便了人们的出行。近年来，中国大多数地区的交通运输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公路、铁路、航空、水路等运输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据统计，到 1998 年，全国公路营运里程达 127.8 万公里，铁路营运里程达 5.7 万公里，内河营运 11.03 万公里，民用航空营运 150.58 万公里。随着基础设施建设和动力等的发展，相关服务也都有极大发展。如，公路运输方面，路况日益改善，运力得到很大提高，特别是一些个体运营的参与，使得各地区

的客货运量大增,服务质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1998年全社会公路客运总量达125.7亿人次。正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铁路大提速工程,也使铁路的运量和运速有了较好的改善,大大方便了人们的出行,为人口的流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条件。目前,西部地区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将为西部各省区运输条件的改善,运力的加强,运输质量的提高创造良好条件,亦将为劳动力东西部的流迁创造有利条件。

第四,一些社会政策的进一步改革将促进人口的流迁。城市化发展道路的选择促使一些地区出台有利于人口流动的政策,一些东部发达省区已尝试以户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排除人口向城市(镇)集聚的体制性、政策性障碍。如,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鼓励和引导农村人口向城镇聚居;改革住房、社会保障、教育等体制,使之逐步适应人口流动的新环境;积极调整就业政策,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设计对城市各种就业岗位按照统一标准,通过考试和考核择优选用人才,为农村劳动力创造一个平等竞争参加就业的机会;积极鼓励投资移民;对在大中城市连续工作满5年并有固定住所的本省合同制农民工,直接转为工作所在地户口;鼓励家庭移民等。这些有利于人口流迁的政策取向,为积极引进并留住外来的优秀管理人才、经营人才、技术人才和熟练技术工人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各类政策中,人才政策可能对人口流迁产生的影响最大。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不发达地区,都有自己所急需的人才,一方面对所需人才要通过培养来满足,另一方面就是要通过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吸引外部人才来满足本区域发展需求。因此,哪个区域的人才政策更优惠、更适于个人发展,就必然更会吸引各地人才的涌入。如上海最近出台对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或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外省市人才,通过为其办理引进人才工作证的方式,使之取得合法在沪工作资格,为外地人才进入上海拓展了通道。上海开放的态势、活跃的经济加之良好的人才政策,必将吸引更多相关人口的流入。不同的地区经济发展政策也将从一个重要方面影响人口的流迁。如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对西部地区经济的活跃,以及西部总体的投资都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东部地区一些工厂、企业等均有意与西部地区不同的地方合作开发,由此必然引起一定量的人口流入。同时西部地区自然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的实施,必将吸引一些流迁人口的进入。此外,西部各地区人才柔性流迁政策的实施,也将吸引一批相关人才流入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的开发提供人才条件。

第五,就业观念的更新,成为人口流迁的一个重要动因。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雇用终身制逐步被打破,相关的职务、医疗、住房、教育等福利性补贴逐步减少并取消,从而为人口跨地区、跨部门、跨身份的流迁打下了基础,也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就业观念。人们不再只盯着国家机关或国有企业等少数单位或行业,而是将目光转向一些具有更多发展机会和挑战性的就业行业,如外资、三资企业、乡镇企业,甚至独立经营。“三资”企业、乡镇企业等的兴起,直接吸纳了相当多的农村劳动力,为人口的城市化和农村剩余劳